

教宗方濟各的軼事

傅南渡著

郭春慶譯

當教宗方濟各被選出在聖伯多祿大殿出現時，他和聚集廣場的民眾見面，說選舉教宗會議中樞機「為尋找新教宗差不多走遍天涯地極」。在這篇文章裡我被邀請與你分享新教宗的某些故事。我希望透過這些故事，你會對教宗方濟各的個性、風格、行事方式及其觀點，認識多一些。

正如樞機選舉教宗方濟各，《神思》的主編亦決定選擇天涯地極的某人來寫這篇文章，這個決定可能有好的理由。像方濟各一樣，我的祖父母都是歐洲移民，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來到阿根廷。我亦出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從阿根廷的首都，未來教宗方濟各，小若瑟貝爾戈利奧出生(1936年)及成長之處，走路約十分鐘。他在1953年察覺司鐸的召叫。我亦是耶穌會士，亦曾經是同一阿根廷省的會士，貝爾戈利奧神父擔任這個省的會長(1973-1979)，留下深遠的影響。我的初學導師及長上是貝爾戈利奧神父的好友。我寄宿在就讀的聖彌額爾聖若瑟大書院，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市郊。那是貝爾戈利奧神父研讀神學、晉鐸(1969)、成為院長(1980-86)及培育許多年青阿根廷耶穌會士的同一學院。最後同樣與大多數阿根廷人看作重要的，我們倆都飲「老友記」(一種阿根廷茶)和喜愛足球，雖然稍有差別：教宗方濟各是「聖老楞佐」隊的球迷而我是「魄力河」(River Plate)的擁護者。換句話說，雖然我從未有機會和教宗方濟各見面，說我不認識他是不公平的。

「骯髒小堂」

當我做初學時，聽到有關未來教宗方濟各的第一個軼事。八十年代早期時，聖彌額爾堂區主教贊同貝爾戈利奧神父開始在堂區提供眾多剛到埗的貧窮移民及工人牧民照顧，他們住在圍繞大書院 Colegio Maximo 的「貧民村」。神父成為新創辦的「聖若瑟長老」St. Joseph the Patriarch 堂區的首位牧者。我在初學培育的第一個週末被派去幫助另一位初學修士，逐戶邀請鄰居的小孩來參加主日彌撒。像牧羊人集合羊群一樣，我們行過這堂區「貧民村」的泥濘橫街窄巷，每人分組帶領來自「貧民村」周圍的兒童到堂區一間教堂。堂內一片混亂及污穢，但是充滿活力、雜音和笑聲。然後，我的夥伴對我解釋：「五年前不像這樣的」。那時候，一班修女住在小堂附近，用作家庭教理。教堂十分清潔、整齊，並且秩序井然，但來參加主日彌撒的兒童及成人寥寥無幾。當貝爾戈利奧神父成為堂區司鐸時，他告訴修女鄰近還有很多兒童未曾接受要理，而這些兒童都是附近最貧窮的。修女解釋說兒童必須和父母共同參與家庭要理節目。貝神父堅持說這些家庭多數不會為家庭要理而來，因為父母週末工作，或者由於父母對教會認識不多，或只因他們沒有雙親。貝神父堅持說：「您們只接觸到為數很少的人，卻拋棄了那些有更大需要的人...，應該有其他方法接觸這些人，並為他們提供牧民需求」。修女們仍然不同意。接著的主日，貝神父派中學的年輕會士去鄰近的街上，叫他們邀請所有兒童參加彌撒及開始正常的主日學。就在那個主日，聖堂突然擠滿兒童，他們的腳多數蓋上泥塵，有些甚至赤足，滿面污垢，不少滿頭跳蚤，我的會士同伴講述。為可憐的修女太過份了，她們決定辭職，並在那個主日把教堂鑰匙交給貝神父。

事件發生後三十年，教宗方濟各對我們說，他「寧願教會由於拋頭露面受挫傷、痛苦和骯髒，也不要由於不健康的封閉，和

依戀自身安全的教會」，「一個為窮人的貧窮教會」，「一個旅途上，願意接觸人類生活需求福音之光的教會」。他對教會的願景，及從起初牧民經驗的指引原則，並無改變，但他過去頗為「權力」的作風逐漸柔和。就如他承認，藉忍耐和跟異見者交談的能力，這種作風將會轉變。

往「天涯地極」移居的家庭

像千萬的阿根廷人，貝爾戈利奧出生在意大利的移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離開祖國，遠涉重洋，在新世界及新文化中，重新開始生活。這個決定需要勇氣把過去的關係割掉，並希望開始建立他們新的未來。阿根廷出生的第一代孩子，例如喬治馬里奧 Jorge Mario，在舊世界沒有大家庭的支持，首先從各自家庭的愛得到養育，然後藉親密的友誼，兩種價值在阿根廷文化中很受重視和珍惜。

像當時大多數的移民家庭，貝爾戈利奧的祖父母抵達布宜諾斯艾利斯海港，行囊中有他們能攜帶的，放下原本家園所享受的大部分物質財富、關係及權利。家庭以尊嚴及謙遜面對新的挑戰，逐漸灌輸喬治馬里奧很多最重要的價值，標誌未來教宗的性格。年輕的喬治馬里奧從父親學到簡樸的價值，本能地拒絕一切浮華及驕傲的表達，配合尊重每個人，不論他或她的地位，文化或宗教。貝爾戈利奧慣於引用他跟父親學到的一個重要原則：「當你向上爬時，記得和每個人打招呼，因為這些人將會是你跌倒時遇到的人」。他的父親亦為未來的教宗，逐步培養個人努力及工作尊貴的價值。他的父親是個會計師，能夠賺錢供應家庭基本的需要。不過，當喬治馬里奧十三歲時，他的父親給他找到一份學校假期的清潔工作。「我很感激家父叫我工作」，貝樞機在

一次訪問中說：「工作在我生命中使我得益很多」。在那些日子裡，他發覺工作是人性尊嚴不可剝奪的源頭，也是使他對別人開放的社會活動。當他攻讀化學時，他在實驗室工作，他的老板是共產黨人，在阿根廷軍政時被綁架及殺害。「她教我工作的嚴肅」他說：「我欠那偉大的婦人很多」。他從母親學會喜愛文學、藝術及音樂。他從祖父母接受的深愛，他學到長者在兒童教育擔任的重要角色，和建設一個健康的社會。但最重要的，從他的家庭，喬治馬里奧收到深信天主愛的恩賜，它將會是他未來司鐸召叫的基礎。

「懷有慈悲並揀選」

1953年9月21日的早晨，聖瑪竇節日，十七歲的馬里奧和朋友準備慶祝春天節日 (Spring Day)，他決定去堂區教堂辦告解，那次告解將永遠改變他的生命。「那次告解，某些怪事發生在我身上，我不肯定是什麼，但它改變我的生命，它使我吃一驚；我有尋找某個早已等待我者的奇怪感覺。天主先遇見我……從那天起，祂為我是那常主動的帶頭者」。但那天啓發年輕馬里奧神父的召叫的，不但是「被遇見」的驚奇，而且是主仁慈地看著他，挑戰他。這種個人被救贖及寬恕，與此同時，被揀選及邀請的深度體驗，會成為佐治馬里奧的司鐸靈感的主要來源：「去幫助每個人體驗天主的仁慈，及祂對他或她的個人召叫，為了使命」(49頁)。「懷有慈悲並揀選」——聖伯特 Venerable Bede 用作描述耶穌召叫瑪竇皈依的方式——成為將來貝爾戈利奧主教的座右銘。當他做羅馬的新主教時想保存的牧徽。不過，要等四年之後喬治馬里奧才最終決定入修院。觸發這決定的事件是使喬治馬里奧失去部份右肺的致命感染。一位修女探病時對他說：「你正在

效法耶穌」。喬治馬利奧聽了這話感覺十分平安。這話不但驅策他主動接納主的邀請，而且是皈依的時刻，按他了解人類的痛苦和限度，和超越它們的需要。「痛苦本身不是德行，但我們假設它能成爲德行的方法」。我們被召叫作完滿及喜樂，而答覆這呼喚中，痛苦並非限度，只有藉天主的受苦，彰顯在基督內，我們才能了解人類痛苦的全部意義。

「偕同耶穌」

貝爾戈利奧入教區修院後開始認識耶穌會士，並決定成爲其中一員。當史神父 (Fr. Antonio Spadaro SJ) 問教宗方濟各，什麼吸引他入耶穌會時，他回答說：「我要多一些，但不知道是什麼」。然後補充說：「三件事特別使我對耶穌會印象深刻：傳教精神、團體及紀律；這真是奇怪，因爲我的確是個缺乏紀律的人，但他們的紀律，時間管理的方式——給我深刻印象」。很難想像這個「缺乏紀律的人」怎能駕馭繁重的事務，和苛求的工作計畫，如果沒有跟耶穌會士學習紀律。傳教熱忱爲他的修會召叫十分重要。貝爾戈利奧當讀書修士時，甚至想奉獻自己在日本做傳教士，但長上沒有容許他這樣做，因爲健康問題。後來他以年青阿根廷會士培育者身分，鼓勵他們多個投身傳教。他對團體生活、伙伴及友誼的需要，在他選擇和其他司鐸及主教一起，住在聖瑪爾大院所，取代搬去宗徒殿宇內的宗座套房，的確表露無遺。

完成哲學課程後，他被省長派去聖菲市 Santa Fe 無染原罪中學教心理學及文學。那些日子是年輕的貝爾戈利奧開始發展三樣酷愛、喜好及興趣，這將表現他的牧民及溝通特色：1) 他對文學的酷愛，從家庭獲得，但在會士人文培育中加深，2) 他對青年的

關愛，和 3)他對教育的興趣及關心。「我非常愛護他們 (我的學生)」。貝爾戈利奧記起：「我想多謝他們所有賦予我的好處，尤其迫使和教導我做個『弟兄』更多過『父親』」。他用圖像取代概念作溝通，透過故事而非理論，並且藉著簡短句子代替冗長複雜的段落，出於他渴望接近學生。他以健康明辨的冒險象徵教育，包括提醒學生一隻腳放在過去所接受的穩固之地，同時鼓勵他們把另一隻腳向前創新地移往不知之處：「我們若不冒險就沒法前進，基於純粹冒險，我們亦不能前進」。

學習引領船隻越過未標明的海洋，同時面臨惡劣多變的天氣

貝神父於 1960 晉鐸後或不久就做初學導師，然後在 1973 年 8 月 5 日被歐魯伯總會長神父選為新任省長。那是個極之動蕩不安的年代，不但為國家，亦都為教會及耶穌會。一股暴力及仇恨在阿根廷慢慢加強。最終暴力以軍事獨裁的戲劇結束，從 1976 至 1983 年軍事專政統治全國，折磨及殺戮千萬被控告為「左派」的人。這些年都是梵二大公會議後的風暴危機年，以強力打擊阿根廷耶穌會省，致使將近四份一的司鐸及四分三的讀書修士決定出會。剩餘的會士完全迷茫，每人獨自辨別「時代訊息」，就如 Viso 神父憶述。整個宗教及司鐸培育，包括神哲學研讀，必須修正去回應梵二文獻所展開的新方位。使問題更複雜的，是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薩爾瓦多耶穌會大學，正處於完全混亂狀態中，負債累積超過二百萬美元。

要面對這龐大的挑戰，連有經驗的人，是一項不能克服的任務，為一位那時只有三十六歲的年輕神父，以他只有初學導師的經驗，就更不用說了。但貝神父謹守服從聖愿，並盡全力履行任

命。那會使富經驗的省長不知所措，而在無休止的明辨過程中的，卻未使這年輕及缺乏經驗的省長退縮進行活動。他將要穿越未標明的海洋，面臨內憂外患。他用頗為簡單的依納爵術語了解情況：在混亂時保持不變，緊守混亂前的基本方位。首先，他設定「航線」，確定省分三「星」的方位，認為這是使命及身分的根源：1) 返回依納爵靈修，2) 恢復培育過程中的耶穌會紀律，和最後同樣重要的，3) 重新與人一起。藉著彌格爾神父 (Fr. Miguel Angel Fiorito SJ) 協助，他敦促會士瞭解和給國內人士講授神操，尤其是青年。給青年講授神操，成為他推行聖召的最有效策略。他把年輕會士的培育委託信任的人照顧，他重整大型培訓房舍的結構，例如大書院，把團體紀律及深度研讀放置於培訓節目核心。最後，貝爾戈利奧清楚了解天主子民的信仰陶成會士的心，教導他怎樣做一位牧者。和信友緊密聯絡及承諾保持會士身心健康、聖召旺盛。在「阿根廷學苑」的解放神學中，教會「對貧窮優先」的文化因素較社會-政治因素更享有優先權。這選擇和承諾陪伴流行的宗教和貧窮的虔誠聯繫，多過主義的思想課題。貝爾戈利奧明白「以貧窮者為優先」應該首先對他們基本上的牧民承諾，而並非主義或社會政治的承諾。不是很多會士瞭解或同意他的看法和方位，但貝爾戈利奧仍然繼續。「我還年輕時就做省長，我必須處理困難的情況，突然及自主地作決定，我做決定的權力及快速的決定，引致我嚴重的問題，及被控訴為過分保守」，教宗方濟各承認。

貝爾戈利奧在管理會士時表現他的領袖才能，同時在應付軍事政府時展露他的外交技巧。阿根廷歷史的動蕩及痛苦年代有很多關於貝爾戈利奧的工作報導。他被選任教宗之後，當兩位耶穌會士(Orlando Yorio 和 Francisco Jalics)被軍政綁架之時，傳媒特別

注意他的行動。貝爾戈利奧聽從歐魯伯神父的指示，盡力協助身陷綁架危險的人出國，那幾年被幫助隱藏或出國的名單很長，他不惜代價，即使冒著生命危險，也照樣做。有一次甚至把個人身份證及羅馬領交給樣貌似他的人，使那人能越過境界，逃往巴西。另一次貝爾戈利奧想找機會和當時的軍政總統(Videla 將軍)談話，請他釋放某個被綁架者。沒有任何政治權力，貝爾戈利奧找到正要給他及家人主持彌撒的司鐸姓名。貝爾戈利奧說服那位司鐸假稱身體不適，所以派他代替，因此，他終於能夠在彌撒後和總統交談。以下是貝爾戈利奧想起的那些日子：「我盡力而為，以我有限的經驗和年齡，及所有的少許關係，幫助那被綁架的人」。另一個故事我從專上書院的圖書室管理員聽到的，描述他處理困局的創作能力。專上書院位於很大的軍事基地附近，具備阿根廷最大的神哲學圖書館。一天，有人告訴貝爾戈利奧，軍方決定來焚燒所有關於馬克斯主義的書。貝爾戈利奧沒有浪費時間，找到軍事基地的電話號碼，並請求和最高級負責軍官面談。當將軍拿起電話時，貝爾戈利奧對他說：「將軍，早晨，我是貝爾戈利奧神父，耶穌會省長，從專上書院打給你。我想通知你，在這裡的圖書館，我們有全國關於馬克斯主義最完備的書籍收藏。我只想告訴你，非常歡迎你及你的軍官，隨時來這裡參閱書籍，我相信這些書籍會幫助你們更認識敵人。」將軍回答說：「感謝你的慷慨，貝爾戈利奧神父。」

牧者和培育者

1979 年一完成省長的任期，他的接班人委任貝爾戈利奧神父成為大書院的院長。聖召開始迅速增多，七十年代的空樓，變成八十年代濟濟一堂的房舍，超過五十位培訓中的年輕會士。在那

些年，貝爾戈利奧有機會實施他做省長時想推行的主要原則：「經常的研讀、深沉的靈修生活、和對大書院四周貧窮村民的承諾」，Ernesto Giobando 神父記起，當時他是位耶穌會讀書修士。正是貝爾戈利奧首次體驗做新近形成的「聖若瑟教父」堂區牧者的同樣年份，他組織教理、創立四間小堂、和開始兒童中心。貝爾戈利奧在某次電台訪問中說：「當我和人一起時，我感到做司鐸最美麗的時刻，偕同尋求耶穌的人上路，將永存我心中」，他回憶起擔任堂區司鐸的那些年。

作為培育者，貝爾戈利奧要求年輕讀書會士，在靈修生活及研讀中的紀律，和對天主子民的承諾。除了日常的功課，院長請他們執行謙遜的任務，幫忙大書院的日常服務，包括書院農莊的工作。1984 年貝爾戈利奧命令剛到步的 Gustavo Antico:「今天你往豬群去」。Antico 記得為貝爾戈利奧奉獻工作的時間為司鐸的培育是很重要的。「他是很苛求的...但他絕不要求別人做他不做的，他也會每天幫助我們照料豬隻」。逢週末時，貝爾戈利奧叫年輕的讀書修士去教兒童及青年要理，探訪病弱和老人，並與人同在。在星期天，如果一位讀書修士在午飯前早到大書院的飯堂二十五分鐘，他會叫他回去堂區，對他說：「你還有二十分鐘去服務天主的子民」。

貝爾戈利奧的培育方式使當時的年輕會士產生不同的反應，取決於他們的性格，儘管很多人會認為他是個「權力主義者」，但其他人會多謝他考驗他們，並提供清晰的原則去發展他們的耶穌會士培育。

創造相遇與合一文化的使命

貝爾戈利奧於 1986 年結束他的院長任期，在德國求學及短暫逗留之後，他被長上遣往哥都巴 (Cordoba) 耶穌會會院，從事告解神師職務，住在那裡直到 1992 年，那年被提名做布宜諾斯艾利斯總教區的輔理主教。

至多幾年時間，貝爾戈利奧成為輔理總主教(1997)，總主教(1998)，然後樞機(2001)。從 2005 到 2011 年，他是阿根廷主教會議的主席。

自去年選任教宗，國際傳媒遞交無數描述貝爾戈利奧主教與教區親民的故事：他對司鐸的照顧、他給教友的授權、他經常坐公車探訪貧民區、他在監獄和艾滋病人舉行彌撒、在主教堂他把專注給找他的人等等。透過這些故事，我們可以看到，在他內的一切恩賜及理想，已在這位牧者心中成熟。作布宜諾斯艾利斯主教，貝爾戈利奧不斷努力實現他的理念：確定貧窮的教會是為貧窮人的、努力答覆上主的召叫：「走出舒適地帶，為了接觸一切需要福音之光的『邊緣』」。我相信貝爾戈利奧內心的肯定及熱誠從未改變，但改變的是他的方法。一個因為缺乏交談、深度政治分歧及經濟不正義而受創傷的國家，被隔離及邊緣化，貝爾戈利奧漸放棄「權力」的方式，他想建立交談、共識和相遇的可能。

貝爾戈利奧主教的至交，猶太經師 Abraham Skorka，寫過貝爾戈利奧的執着可以用四個字作定義：相遇和合一。布宜諾斯艾利斯主教堂的巨大牌坊，闡明若瑟和兄弟在埃及相遇的出谷紀情節。貝爾戈利奧解釋：「它是正值國家重組的過程中，為表示所有阿根廷人相遇的渴望，這是我們還未清償自己的『債』，因為我們阿根廷人不容易彼此相遇」。「相遇」肯定在貝爾戈利奧所理解的牧者使命中，是最重要的字眼。作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主

教，貝爾戈利奧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表明他「對相遇的渴求」：領導他的司鐸出去與人相遇，尤其貧窮的、他和不同基督教會的合一相遇、他和各派宗教領袖的交談及友誼、他不斷呼喚不同反對黨派和政府的會晤、他在講道中請求父母和子女，及他們和祖父母之間作交談等。這些範疇都是貝爾戈利奧主教嘗試從中建立相遇及合一。

這是教宗方濟各上次去中東和聖地所表示的同樣渴望和熱誠，為建立相遇及交談。「相遇的文化基本上假設對方有很多要給我」，那時的貝爾戈利奧主教作解釋。

舊酒與酸酒

「誰是喬治貝爾戈利奧？」Fr. Antonio Spadaro 神父問教宗方濟各。一會兒沉默及反省之後，方濟各回應說：「我是上主垂視的罪人。」

「懷有慈悲並揀選」是方濟各的座右銘，來省察自己的罪過及限度，由於那位仍想召叫他的上主。這幾頁所敘述的各個故事內，我相信教宗方濟各的忠誠，在於他表達罪惡傾向的經驗，與此同時，在於他對仁慈上主轉化力量的體驗。貝爾戈利奧的最大恩寵，就是把目光放在正確的地方；不在自己身上，而在看著他、寬恕他和召叫他的上主。貝爾戈利奧用「舊酒」和「酸酒」作隱喻，講述我們做人的個人成長。當我們的信仰生活，是把目光放在自身時，絕不會成為「舊酒」，只是「酸酒」而已。「而那正是祂要我懷著慈悲的心看人，好像我為祂揀選他們一樣，一視同仁，因為我們都被天主所揀選及關愛的」，喬治貝爾戈利奧，來自世界天涯地極的教宗說。